

# 黄龙庙会：

## 藏彝走廊多元文化空间的一个范例



◎ 汪志斌

**【摘要】** 藏彝走廊是中国三条主要的民族走廊之一，其历史沉积的久远性、民族构成的复杂性、文化形态的多样性构成了一个独具特色的多元文化空间。这一多元文化空间的一个相当重要的展现，就是这条走廊上众多的民族文化汇聚场所。本文以四川松潘黄龙庙会这一多元文化汇聚场所为切入点，通过对黄龙庙会多元文化生态及其形成历史的探讨，从一个具体的点上展现藏彝走廊文化空间的多元性与复杂性，并由此思考在整体上把握藏彝走廊历史文化面貌的可能路径。

**【关键词】** 藏彝走廊；多元文化空间；松潘；黄龙庙会

**【中图分类号】** K2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0139(2010)01-0039-4

藏彝走廊，北起甘肃，南到西藏东南（察隅等）<sup>[1]</sup>，是地处“藏东-川西”高原峡谷地带的一条民族走廊<sup>[2]</sup>，也是一个值得单独加以审视与研究的“历史-民族区域”<sup>[3]</sup>，其历史沉积的久远性、民族构成的复杂性、文化形态的多样性构成了一个独具特色的多元文化空间。

这一多元文化空间的一个相当重要的展现，就是这条走廊上星星点点散布着的民族文化汇聚场所（即通常在非物质文化遗产领域中使用的狭义上的“文化空间”概念）。这些文化场所，以其不同程度、不同内容和不同型态的多元文化汇聚与互动结构，构成了藏彝走廊这一多元文化空间不同层次的文化生态网络结点，成为介于“藏彝走廊”这一整体概念和这一区域具体文化存在之间的中间范畴，自然，也成为理解和把握藏彝走廊多元文化空间的一个重要切入点。

松潘黄龙寺的黄龙庙会就是这样一个典范例子。

松潘，位于四川省西北部、青藏高原东北缘，是藏彝走廊北段一处典型的多民族共聚地区。这里是司马迁《史记·西南夷列传》所记载的“压僰”（“冉僰”）统属之地，“其俗或土箸（土著），或移徙”的记载，表明这里很早就是一个部族（民族）混居的地区。《后汉书·冉僰夷传》更明确指出，“其山有六夷七羌九氐，各有部落”。秦在此设湔氐县，汉代设湔氐道，到唐代则是唐蕃交锋的前沿。自明代以来，形成了以汉、藏、羌、回为主体的多民族共存—互动的文化生态结构，并延续至今。这种共存—互动的多元文化生态，正是藏彝走廊多元文化空间最为典型的基本结构，而黄龙寺庙会则

**【作者简介】** 汪志斌，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四川省康藏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四川 成都 610072。

又是松潘地区多民族文化生态最为集中的展示。

松潘黄龙寺，坐落在藏彝走廊北段、岷山山脉中段的一条南北走向的山谷中，坐南朝北，北眺涪江之源，南望岷山主峰雪宝顶。据民国《松潘县志》记载，松潘黄龙寺为“明兵使马朝觐”所建，距今已有“五百余年”<sup>①</sup>。至于黄龙庙会或黄龙寺庙会，在当地人印象中也有至少同样久远的年头。光绪元年（1885）马尧安《黄龙寺述览》说黄龙庙会“岁以为例”<sup>④</sup>，20世纪80年代初收集的黄龙庙会山歌也有“庙会相传五百年”<sup>⑤</sup>的记忆。

松潘当地通常将黄龙庙会理解为纪念黄龙真人得道的盛会，但有关黄龙真人的来历，当地民间至今各有不同说法。汉族民众习惯将黄龙寺和黄龙庙会的渊源附会于那位民间传说中帮助大禹治水的黄龙或黄龙真人；羌族则有黄龙真人本是当地氐羌部族一位首领的传说<sup>②</sup>，他曾帮助大禹治水，后隐居于岷江边上的牟尼沟，最终乘白鹿到雪宝顶下的黄龙沟修炼，黄龙寺和黄龙庙会都是为纪念这位得道成仙的英雄首领而出现的；而藏族则将黄龙真人同那位在本教文献传说中开启雪宝顶山门的雄帕喇嘛联系起来，民间也有黄龙真人就是按雄帕喇嘛样子塑造的传说。<sup>③</sup>这些传说与故事的多民族差异性同黄龙真人崇拜的多民族一致性构成了黄龙庙会多元共存、互动与融合生成的基本文化生态，成为松潘地区乃至藏彝走廊多元文化空间的一个缩影。

作为黄龙庙会的核心，“黄龙真人”是一个多层次的融合形象，其中整合了松潘地区汉、藏、羌等多民族以“神山—山神”崇拜、龙神崇拜和英雄崇拜为主体的多种文化形态，是在松潘地区不同民族文化间多元并立、涵容互渗的历史演变过程中逐渐融合生成的，<sup>⑥</sup>尽管在符号形式上采用了民间道教的“黄龙真人”名号，但就其主要的内容而言，则是松潘本地多民族信仰文化基于共同处境的汇聚融合。因此，在黄龙寺的“黄龙真人”形象中，沉积着

的就不仅仅是黄龙庙会、松潘地区乃至整个藏彝走廊多元文化空间“共存—互动”的结构型态，在这一形象的最底层，还有着更为重要的东西，即不同民族及其文化之间和谐共存的生存与生活根源。这既是“黄龙真人”形象得以融合生成的起点，是“共存—互动”的文化空间结构的深层基础，是由“黄龙真人”的形象生成而深入探讨多元文化共存、互动与融合生成的内在逻辑所必然触及的根本，也正是黄龙庙会之作为藏彝走廊多元文化空间范例的典型性所在。

## 二

黄龙庙会作为松潘地区多民族文化生态最为集中的展示，并不仅仅限于宗教崇拜领域。黄龙庙会同时也是松潘地区规模最大的“畅坝”活动。如果将有关黄龙庙会的记载和关于“畅坝”相比较的话，会发现二者之间有着惊人的相似，可以说，黄龙庙会就是一次大型而集中的松潘各民族共同参与的“畅坝”，是一次以宗教信仰为主旋律的“畅坝”。<sup>⑦</sup>

“畅坝”是松潘地区的流行民俗，时间在农历四至八月<sup>⑧</sup>。民国《松潘县志》卷一“风俗”之“六月”一条说：“是月麦垂穗，豆结荚，虽季夏犹暮春，士民相率游郊外。设帏帐，携酒食，逍遥于长林丰草间，名之曰畅〔本地方言，即游玩之义〕。”今《松潘县志》明确定义其为“户外郊游野炊活动”：

“畅坝，又称畅，有欢畅舒心之意。松潘地区冬长夏短，冬春季节人们蛰居室内，每到夏秋，藏、羌、回、汉各族群众纷纷外出游玩，这种户外郊游野炊活动，松潘人称畅坝。”<sup>⑨</sup>由于“畅坝”实际上是把松潘人的日常生活搬到了郊外，因而，松潘各民族的文化与习俗诸如锅庄、山歌、多声部等等在“畅坝”中均得到了尽情的展现，可谓集松潘民间文化之大成。

远足郊游的“畅坝”之得以形成是和两个基本

<sup>①</sup> 出自黄龙寺碑刻《黄龙寺赎回庙产记》。民国二十三年（1934）松潘县政府立碑刻石，保护黄龙寺庙产，今碑存松潘黄龙寺前，正面为《松潘县县政府布告（第四号）》，背面即为《黄龙寺赎回庙产记》。

<sup>②</sup> 关于“氐羌首领传说”请参见石川的《朝觐黄龙——探索世界遗产文明的封印》（石川编，台永东摄，四川美术出版社，2004年9月，第12页）。据石川先生确认，此故事为其在松潘考察时收集。

<sup>③</sup> 有关黄龙真人传说详细情况请参见《黄龙地区宗教文化研究》（潘显一、唐思远、汪志斌，巴蜀书社，2010年5月）第94~106页。另雄帕喇嘛同黄龙真人之间关系的传说由西南民大同美教授提供。

因素密切相关的，一个是冬天的寒冷与漫长产生的需要，另一个是农闲时节提供的可能。民国《松潘县志》将此习俗系于“六月”正是同农事直接相关的，“麦垂穗，豆结荚”，正是丰收在望的清闲时节。然而，此时虽是丰收在望，但在古代没有足够的农业科学技术而不得不主要靠天吃饭的情形下，却又基本上是只能无奈地等待的时期。民国《松潘县志》卷八对此一时期天气对农事的影响以及民众惯常的应对措施有这样的记载：

松潘附近地产每年仅收一季。立秋前后十余日、禾稼将熟未熟之时，白昼则虑大雨，寒凝冰雹，夜晚则虑天晴，露积为霜。禾苗受冰雹则籽散满地而包谷亦空，经霜则籽尽枯槁而生机立绝。此二者实农民之大害也。故习惯上制止之法有四：一曰请番僧念经；二曰禁止挖药驮药；三曰安设大磁于山顶，冲散黑云，雹雨立止；四曰收积各种骨头、柴草、柏枝，多处燃烧，烟合成云，寒退霜止。<sup>[10]</sup>

立秋在每年的8月7日或8日，其前“十余日”通常正是农历六月中旬，也正是黄龙庙会的会期（每年农历六月十二到十六，十五为正会），从这时起，对丰歉的忧虑便萦绕不去。从上面的记载可以看到，松潘民众所采用的四种应对措施，一半是实践经验，一半是向神灵祈祷，显示出这段最适合外出畅坝的时间中的无奈。因此，远足郊游同朝圣祈祷结合在一起，也就是必然的事情。尽管黄龙庙会的来由并不全是因此，毕竟，黄龙庙会的场所黄龙沟是雪宝顶神山周围最适合大规模聚会、也最具神奇色彩地方，但在一定意义上，黄龙庙会也仍然可以理解为是从松潘的“畅坝”习俗中演变分化出来的一个特殊形态，是松潘当地民俗集会和宗教朝圣相结合的典范。民国《松潘县志》用“极一时视听之娱”<sup>[11]</sup>来描述黄龙庙会正是对其典型性的概括。

### 三

黄龙庙会典型性的另一个方面是其规模盛大、影响范围广。

松潘的庙会，几乎都是多民族共同参与的，如龙安堂庙会、小姓沟龙头寺庙会、林坡寺庙会、噶米寺庙会、城隍庙会等等，或藏羌或汉藏羌或汉藏羌同共同参与。民国四年（1915）出任松潘知县的

傅渠在其《松潘游记》中就曾记录了他所见到的多民族共同参与的城隍庙会：“每年三月二十一日为神会，未遭变乱时极为热闹，有大戏班演剧本，年会期只有傀儡班而已。渠到任十余日即神会期，首人贴请降香，并请有汉军统带张君石钧暨汉军营长田君文明、何君宝珊暨各机关员绅。见各寨番民男女杂沓，形形色色，奇奇怪怪，目不暇给。汉番人等有不远千里来者，焚香礼神，亦奇观也。”<sup>[12]</sup>

在所有这些松潘庙会中，论规模之大、参与者之多、影响范围之广、内容之复杂多样，当数黄龙庙会。如果说松潘其他庙会往往是当地村寨或县域局部范围内的庙会，那么黄龙庙会就是整个松潘及周边地区各民族的共同盛会。光绪元年马尧安在《黄龙寺述览》中曾这样描写他所见到的黄龙庙会：“上草湾里许至寺前，忽然空旷，帐棚分布如连营，炉火明灭如星光。各部酋长率诸蛮排列大围，环跳互唱，声应山谷，谓之跳歌庄。”当地人汤子清在其诗歌中也有类似的描绘：“香火万家朝六月，羌歌氏舞杂喧填。”<sup>[13]</sup>民国四年傅渠所见则是：

“每年六月十五日为朝山期，汉番到寺朝拜者不可胜计。番人有数千里来者，有自青海、西藏、蒙古来者。各番男女杂沓，形形色色，皆着新服饰、宝器，故又名为番人赛会之期。所有各种衣服多外间所未曾见过者。番中男女多携花巾，或大伞，或跳舞，或唱歌，或跳锅庄，或聚饮，亦多作桑中之约者。会期只一日，第二日则群番男女各背包负伞，纷纷散矣。洵奇观也。”<sup>[14]</sup>可见其当初的盛况。

自改革开放以来，黄龙庙会得到恢复，据当地政府统计，1980年参加庙会的群众达六千多人次，1981年则达一万四千多人次，参加人员来自方圆七八百里范围。<sup>[15]</sup>但随着黄龙风景名胜区的旅游开发和景区管理的加强，尤其是随着黄龙被列入世界自然遗产名录，再加上经济发展的影响等因素，黄龙庙会的规模在不断萎缩，最近几年的庙会人数大致在两千人次左右，2010年则有所增加。

2010年生肖属虎，这对松潘民众尤其是松潘藏族来说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年头。传说雄帕喇嘛就是在虎年开启雪宝顶山门的，因此在松潘藏族的观念中，十二年一轮的虎年乃是雪宝顶神山或山神的“生日”，是一定要去朝拜祈祷的，于是，同乡或同一村寨便结伴而至，成群结队。有些人步行

一整天跋涉一两百里赶到黄龙寺朝拜黄龙真人；往年几乎没有去走的雪宝顶转山内圈线路，今年也有一群虔诚的信徒在庙会期间前往转山；往年庙会上偶尔看到的藏族僧人，今年庙会期间随处可见，无论是格鲁派、宁玛派、萨迦派还是本教寺庙的僧人、喇嘛乃至活佛，都出现在了黄龙寺、黄龙庙会，有些单独朝拜“黄龙真人”，有些则有组织地在黄龙后寺大殿举行仪式、念经祈祷。据笔者在庙会期间所见所闻，参加黄龙庙会的群众人数虽已无法和历史上相提并论，但所来自的区域依然是“方圆七八百里”的传统范围，除松潘本地各乡而外，周边如黑水、茂县、平武、九寨沟、马尔康、红原等都有人前来，传统庙会的各种活动，如撒龙达、堆玛尼堆、挂经幡、转山、朝拜以及山歌、畅坝等，均有保留。因此，总体来说，黄龙庙会的规模已经缩小，但基本骨架与内涵仍在。如何保护这一具有历史与现实价值的文化场所（文化空间），并发挥其应有的积极意义，是一个需要认真对待的问题。

#### 四

黄龙庙会的确是藏彝走廊多元文化空间的一个范例，但绝不是唯一的。全面而系统地梳理藏彝走廊上的这些具有典范意义的文化场所，进而建构这一多元文化空间的文化生态体系，不是本文所能

够承担的。本文尝试从多元文化空间的角度来解读和安置黄龙庙会，除进一步深入认识黄龙庙会而外，主要目的在抛砖引玉。

在中国主要的三条民族走廊中，藏彝走廊是最为著名的一条，其受到的关注与研究也最为突出，“但迄今为止，还没有人对这条走廊上的历史文化形式及特征作出比较全面的概括”<sup>[16]</sup>，“目前要对藏彝走廊的历史文化特点作全面的归纳总结还为时尚早”<sup>[17]</sup>，这既反映出藏彝走廊本身的复杂性，同时也意味着，在有关藏彝走廊的研究特别是整体把握的思考上，需要有方法论的反思。既然迄今为止的研究成果尚不足以支撑关于藏彝走廊的全面而整体的把握，那么，就退后一步，实实在在从局部以藏彝走廊的整体把握为取向去积累。将藏彝走廊这一相对独立的文化生态体系视为一个多元文化空间，并以文化空间的结构结点作为积累的切入点，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像黄龙庙会这样典型的多民族文化共存与互动融合的文化场所（文化空间），在藏彝走廊的文化生态结构中处在关键的位置，它们的数量以及每一个这样的文化场所具体的文化内涵、文化生态结构、在藏彝走廊多元文化空间中的层次地位等等，都有待逐一的考察与研究，每一次对这样的文化场所的系统梳理也都必然意味着朝向关于藏彝走廊这一多元文化空间整体把握的迈进。

#### 【参考文献】

- [1] 费孝通.关于我国民族的识别问题[A].费孝通.费孝通文集[C].群言出版社,1999.第7卷214-218.
- [2] 李星星.粟(小米农业)经长江上游南传的途径与方式[A].段渝.巴蜀文化研究(第三辑)[C].巴蜀书社,2006.183.
- [3] [17] 石硕.藏彝走廊的历史文化特点[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7,(1).
- [4] [10] [11] [13] 张典,徐湘.松潘县志[M].民国十三年(1924):卷五“坛庙”之“黄龙寺”条所附“马尧安《黄龙寺述览》”,卷八“祥异”之附录,卷一“风俗”之“六月”条,卷五“坛庙”之“黄龙寺”条所附“汤子清诗”.
- [5] 瑶池仙境黄龙寺[M].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50.
- [6] 汪志斌.松潘黄龙寺“黄龙真人”渊源探析[J].宗教学研究,2009,(1).
- [7] 潘显一,唐思远,汪志斌.黄龙地区宗教文化研究[M].巴蜀书社,2010.320-321.
- [8] [9] 松潘县志编纂委员会.松潘县志[M].民族出版社,1999.827.
- [12] [14] 傅樵斧.松潘游记[M].中国国家图书馆数字方志资源库提供:78,93-94.
- [15] 关于申请将黄龙寺列为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的报告[R].松府发[81]23号文件.松潘县档案馆.
- [16] 李星星.藏彝走廊的历史文化特征[J].中华文化论坛,2003,(1).

(责任编辑 王 炎)